

# 新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时代背景与路径选择

卢春龙

**内容提要:**目前,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刻不容缓,本文系统论述了其两大时代背景: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了新政治学学科建设需要紧扣时代背景,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一个宏观的视野去理解学科建设,强调新政治学学科建设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并进而提出了新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路径:首先要转变学科建设的理念;其次要调整学科建设的内容;最后要使用新方法与新技术。

**关键词:**新政治学学科 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人才培养体系

环顾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改革与创新、重视内涵式质量发展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正在蓬勃发展并走向深化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已经引发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并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构成了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直接背景。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运动相继兴起,各个学科都在主动寻求变化,探索学科建设的新理念、新内容、新方法、新技术<sup>①</sup>。在这一宏大的新文科运动背景之下,政治学作为一个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传统学科,也需要主动求变,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探索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之路。

“新文科建设”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希拉姆学院(Hiram College)于2017年提出,初衷是为了把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中,打造“新技术+文科”的课程培养体系。新文科建设的理念很快传入中国,并得到国内学界的积极响应,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相继提出“新经济学”“新法科”建设的理念。在政治学学科领域,一些学者也发出声音,要求对政治学学科进行改革与创新<sup>②</sup>。在如何建设新政治学学科的路径上学界有着不同的路径选择。总体而言,有四种路径<sup>③</sup>,这四种路径也是新文科建设的四种路径,政治学学科作为新文

① 吴岩:《加强新文科建设 培养新时代新闻传播人才》,《中国编辑》,2019年第2期。

② 相关的论述包括:王绍光:《从源生性的大问题切入新政治学》,《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1辑;杨光斌:《建国历程的新政治学:政党中心主义、政治秩序与“好政治”三要素》,《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1辑;潘维:《中国道路与政治学理论庙堂的结构》,《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1辑。

③ 关于新文科建设不同路径的选择,可以参阅刘曙光:《新文科与思维方式、学术创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黄启兵、田晓明:《“新文科”的来源、特性及建设路径》,《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2期。

科的重要组成学科之一,也受着新文科建设路径的影响。

第一种路径强调,新文科的“新”主要体现为人才培养理念的新,这一路径较为注重人才培养的综合能力和服务社会的成效<sup>①</sup>。受这一路径的影响,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重点强调政治学人才培养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创新问题。

第二种路径强调,新文科是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第四次工业革命等进行学科交融和跨领域研究的产物,目的在于使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新问题。受这一路径的影响,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重点强调政治学研究的跨学科融合以及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的创新。

第三种路径强调,新文科是哲学社会科学在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挖掘其自身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结合以后出现的新变化,目的在于形成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能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主动性。受这一路径的影响,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重点强调中国政治学学科在新的时代如何获取国际话语权的问题。

第四种路径强调,需要站在学科体系的高度来探讨新文科建设的全局性问题<sup>②</sup>。新文科建设的基础在于人才培养,通过新的教学体系、教材体系来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但是,新文科建设也在于学术研究,只有通过学术研究才能产生新的理论体系,新的理论在经过沉淀之后就会转化为教材体系;新文科建设也要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大局、服务于国家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获得国际话语的主动权,新文科建设的目的就是产生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能够影响世界、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站在这一路径的高度,我们可以看到,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改革创新。这就需要统筹四个层面的工作: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其中,人才培养是根本,学术研究是龙头,话语体系是标杆。

下面,笔者简单介绍一下政治学学科所面临的新时代背景。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政治学学科,这是新政治学学科建设的直接动因。

## 一、新时代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新背景

当下,政治学学科的发展遇到了两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背景: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与知识的方式,这无疑对传统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都构成了挑战。二是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调整,正处在百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在新一轮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调整之中,中国正日益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转型过程之中。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过程之中首次离世界舞台中心如此之近。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之中,中国贡献了关于政治发展道路的中国智慧,如何认识、理解中国式治理的道路选择并进而建构独特的中国政治话语体系显然成为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

第一,关于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第一个时代背景,即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问题。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历史上共发生了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发轫于英国,以蒸汽技术革命为主要特征。第二次工业革命发轫于范围更为广泛的西方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以电力技术革命为主要特征。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首先发起了计算机与信息技术革命并影响至全世界,促进了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① 周毅、李卓卓:《新文科建设的理路与设计》,《中国大学教学》,2019年第6期。

② 类似的主张,请看张俊宗:《新文科:四个维度的解读》,《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轫并影响至全球范围,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基因工程等为主要特征,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其中,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可以说,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都重新塑造了高等教育的形态,也改变了高等教育与工业革命的关系。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高等教育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象牙塔,为数不多的大学奉行精英教育的准则,对工业革命的进程没有太多的介入,两者之间的关联度不是很强。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发生联系并产生紧密的互动,一大批新型理工学院应运而生,服务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人才需求,但是在两者的互动关系中,仍然凸显了工业革命的主体地位,高等教育则处于回应工业革命需求的被动地位。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高等教育日益走向普及化,储备了大量的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人才,而且大学的使命开始日益强调服务社会的功能,强调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这使得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始推动工业革命走向深入。高等教育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呈现出密切互动的关系。当下,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更是进一步改变了高等教育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简单线性互动模式而日益呈现多样化,高等教育在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甚至有学者因此而断言,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于高等教育的依赖性日益增长,高等学校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轴心组织,为一国的产业升级、社会经济增长提供了原动力<sup>①</sup>。

总而言之,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服务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即未来政治学学科的建设要能够帮助国家的政治发展更好地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

第二,关于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第二个时代背景,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智慧。在新一轮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调整之中,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的政治学学科一直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缺少地位与声音,不能更好地服务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政治学学科一直是西方政治学学科的学生,学习西方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sup>②</sup>,这就使得中国的政治学学科一直不能有效讲好中国自己的政治发展故事,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符合自身国情的解决方案。

政治学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必然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发展战略,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然而,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生了声势浩大的行为主义运动,该运动的兴起是对传统政治学的颠覆与革命,之后,政治学学科开始出现科学化的趋势,政治学这一学科俨然可以成为一个可以量化的、价值中立的科学学科<sup>③</sup>。

从表面上看,美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打着科学主义的旗帜,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学学科建设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于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开始学习美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实际上,美国人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比较政治学与行为主义革命,研究理论上转向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理性选择等实证主义方法,这些都是为美国的国家战略服务的。原因有三:其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越来越多的亚非拉民族国家摆脱了殖民地的枷锁,走向民族独立与自主,寻求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都把眼光

① 马卫方:《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关系演进及规律:以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为例》,《高等理科教育》,2019年第3期。

② 朱云汉:《突破与超越: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经济导刊》,2019年11月刊。

③ 叶娟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中立”:以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科学理想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转向美国,向美国学术界寻求解决方案。其二,传统政治学被指责为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因为它们在当时只研究西方民主国家,而忽视对殖民世界的研究。这就需要传统政治学转向研究广大的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而传统政治学的研究主题与方法则需要转向研究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制度与政治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三,美国政治学者基于美国社会的实践,构建出政治系统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等理论,其核心主题都是强调线性发展观,如果亚非拉的新兴民族国家遵循他们的这些理论所强调的发展路径,就会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令人遗憾的是,那些遵循了美国政治学者建议的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不仅很少能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且还陷入了政治衰退与动乱之中。中国由于坚持了自己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sup>①</sup>,自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治理的绩效引起了世界各国的赞赏,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独特的发展与治理模式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的认可<sup>②</sup>。

如何基于中国大地正在发生的实践,用中国声音讲好中国的政治故事,这是我国新政治学学科建设特别需要重视的地方。首先,要打破对美国政治学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迷思。其次,要重视中国大地所发生的实践,创造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此外,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也要重视人才培养,要瞄准未来、布局长远,要建一批国内政治学人才培养的高地。新政治学学科要制定仰望星空的人才培养计划,为未来培养一批能够产生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学学者、培养一批政治学的国际级大师。

## 二、新政治学学科建设要处理好四个体系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系列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到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四个体系。其中,人才培养体系又涉及到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诸多方面。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的论述为指导,提出加快新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思路与建议<sup>③</sup>。

其中,政治学人才培养体系对应的是政治学的人才培养问题,政治学学术体系对应的是政治学的学术理论研究,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对应的是政治学学科内部的二级学科体系构成,而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对应于国家的文化遗产与创新、获得国际话语权的主动性,换言之,就是用中国声音向全世界讲好中国的政治发展故事。需要强调的是,政治学人才培养中的教学体系与教材体系来源于学术体系所形成的共识性成果;而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则反过来又可以推动学术体系研究的发展,它是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根本依托;话语体系则高于学术体系,但又植根于学术体系,政治学学术研究的水平与属性最终决定了话语体系的水平与属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联系,相辅相成<sup>④</sup>,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比如,学术体系可以转化为人才培养中的教学体系,而话语体系与学术体系之间也可以相互转化。

① 孔丹:《正确的政治道路是中国成功的关键》,《经济导刊》,2019年11月刊。

② 张树华、王强:《新中国70年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价值与世界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0期。

③ 张文显教授在论述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时,使用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才体系四个体系的论述方式,具体参阅张文显:《关于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几个问题》,《中国大学教学》,2017年第5期。

④ 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第一,政治学的人才培养体系主要包括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等方面,其中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是最为直观的表现形式。按照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sup>①</sup>,政治学课程体系包括专业类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三大类别。其中,专业类基础课程包括诸如《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学概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外交学导论》《政治学研究方法》等课程,在这些课程里,《政治学原理》《国际政治学概论》《外交学导论》被指定为必修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则有所细分,因为政治学类包括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外交学三个专业,对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而言,专业必修课程包括《中国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对国际政治专业而言,专业必修课程包括《国际组织概论》《国际法概论》等课程;对外交学专业而言,专业必修课程包括《国际法概论》《国际组织概论》等课程。同样,专业选修课程也同样遵循了细分的原则,对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而言,专业选修课程包括《政治哲学》《政治心理学》等课程;对国际政治专业而言,专业选修课程包括《国家安全概论》《亚太政治与经济》等课程;对外交学专业而言,专业选修课程包括《外交战略》《外交史》等课程。由这些专业类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构成的课程体系,就构成了政治学学科的教学体系。通过学习这些课程的知识,学生可以获得政治学类专业知识与方法,掌握国家和政府管理有关法律、制度和政策,通晓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相关的知识。

第二,政治学的学术体系是建设新政治学学科的核心。其构成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思想、原理、基础理论层面;二是研究方法与工具层面。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核,学术体系的水平决定了话语体系的水平<sup>②</sup>。同时,学术体系的共识性成果也会转化为教学体系与教材体系的内容,因此,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可以被定义为“由中西政治哲学、政治学的基础理论、政治学的核心理论、政治学方法论等不同领域构成的学术体系”,在具体操作上,政治学学术体系可以分成:“政治哲学”“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政治学方法论”“中外政治制度”等方面。其中,需要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是政治学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后要重点发展的方向。在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初期,学界大量地翻译、出版西方政治学理论、西方政治哲学的成果。诚然,这在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的初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具有原创性的、立足中国本土的政治学理论却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特别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学基础理论体系严重缺乏原创性的成果。

第三,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是建设新政治学学科的重要基础,学科体系不健全、不扎实,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成为无源之水<sup>③</sup>。按照教育部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目录)来划分,在政治学一级学科目录之下,有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7个二级学科,除了这些目录内的二级学科,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还自主设置了一些目录外的二级学科,比如农村政治学、基层政治学、民族政治学,进一步丰富健全了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但在政治学内部学科体系发展存在不平衡的情形,从整体上来看,相对而言,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学说受西方政治学影响较大,在运用现成的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与对外交往关系这一领域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但是其他二级学科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学科体系的中国特色不够鲜明。同时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

①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编:《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第39—4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②③ 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也远远不足,不能满足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

第四,政治学话语体系是由诸多关于国家、权力、民主、监督等关键政治核心概念的理论、信念和实践经验等所组成的思想体系,它以民族语言的形式集中表达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关于政治生活理想形态的理解。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应该高于学术体系,在四者中处于最高端的位置;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又植根于学术体系、来源于学术体系,政治学学术体系的发展最终决定了话语体系的发展。

我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建设应该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一方面要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另一方面也要借鉴世界各国包括关于国家、权力、民主、监督等话语体系中有益部分。在当下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建设尤其应重视民族性。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学学术体系受西方政治学理论影响比较深,使得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也受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左右而相对缺乏民族特色。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必须用当代马克思主义表达的、基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于理想政治生活的思想,这样才能在世界舞台上传达中国声音、占领国际话语权,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与国际社会对话,改变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弱势状况<sup>①</sup>。

### 三、新政治学学科建设需要坚持新理念

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需要我们树立关于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新理念,并通过坚持新理念来指导政治学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第一要在观念上抛弃对于西方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迷思,要反思西方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在中国的适应性问题<sup>②</sup>。必须承认的是,在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的初期,学术界确实深受西方政治学影响,以至于政治学界使用的核心概念、基本理论、研究方法都是从西方学术界引入的。这些概念与理论在我国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新政治学学科建设需要立足中国大地,重视中国大地所发生的实践,创造出适应中国大地的政治学理论与概念。

第二要积极开展跨学科、跨专业和跨领域研究,积极推动新政治学学科建设。首先,政治学者需要高度重视政治学与工科、人工智能的融合,回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诉求。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方式,甚至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伦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学者对于未来政府功能定位、公民个人权利边界等问题的热烈讨论,特别是对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政治伦理道德问题<sup>③</sup>,学者们表示了深切的担忧,诸如社会权力结构会失去平衡的问题,人们的偏见会出现固化的倾向以及价值观念的分化会出现极化的问题。对于这些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变迁,政治学者需要未雨绸缪,积极开展跨学科、跨专业和跨领域研究,提出自己的超前预判以及进行相关的理论建设。

新政治学学科建设还需要重视与经济学的融合,重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政治与经济领域是相互渗透的,因此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分析,重视运用制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整体分析方法来研究各国的具体情境<sup>④</sup>。正如姚洋教授所指出

① 张宇燕:《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导刊》,2019年11月刊。

② 杨光斌:《中国政治认识论》,第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③ 参见高奇琦:《人工智能:驯服赛维坦》,第十章、第十一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④ 张林:《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和性质》,《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1期。

的,我们需要构建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sup>①</sup>。

第三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作为我国政治学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政治学学术体系中发展较快的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学说等领域,一直显得相对滞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大特色,我们需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经验与规律,并把这些经验与规律上升到理论的层面。

第四要重视人才培养问题,要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为此,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需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政治学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政治学专业应该承担起相应的价值引领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实现各类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为政治学学术界的未来培养人才,培养一批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大师级人物,从而改变我国在国际学术界话语权弱势状况。

#### 四、新政治学学科建设需要重视新内容

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要重视新内容,就是要重视中国政治当下正在发生的实践,基于中国的实践来产生新的理论。而不能简单重复西方政治学的一些研究内容,更不能满足于把西方政治学理论拿到中国场景之下进行简单验证。

第一,新政治学学术体系要对应中国政治的新实践,总结中国智慧、提出中国理论。以民主理论为例,如果按照西方政治学界关于民主的标准,那么得出来的结论一定是,中国是一个非民主的国家。西方学界多个关于民主程度测量的研究团队给中国的民主打分都非常低,认为中国是一个非民主的政体。但西方这些民主测量团队的测量指标是基于西方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的多头政体定义<sup>②</sup>。然而,罗伯特·达尔对多头政体的定义具有典型的“社会中心主义”特征,以社会为中心来建构关于民主的基本理论,这实际上是基于西方多元社会的现实。以此为民主评价标准,中国的民主得分就会很低。事实上据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教授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显示,中国人对于自身的民主状况是比较满意的,且这一满意度在世界各国的比较中也是非常高的。因此,我们要跳出西方式的民主理论,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民主理论,形成中国特色的民主理论体系。

第二,新政治学学科建设在内容上要关注当代中国政治,而不能满足于引进西方政治学的理论。要重视扎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尤其是,要关注当代中国社会中一些新的社会实践形式。比如,第四次工业革命改变了我国政治生活运行的方式,新的网络治理空间开始出现并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新政治学学科建设应该更加关注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重视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从问题出发建构新的政治学理论,而不是套用西方政治学的现成理论。要通过技术引入、跨学科、跨专业和跨领域的综合研究来解决新时代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以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优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来引领新时代政治学的发展方向,提升政治学的学科地位与尊严。与此同时,新政治学学科建设要特别关注我国国

① 姚洋:《构建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中华工商时报》,2016年12月9日。

② Michael Coppedge and Wolfgang H. Reinicke, "Measuring Polyarchy," in Alex Inkeles (ed.), *On Measuring Democracy: Its Consequences and Concomitant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1, pp. 47-68.

家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化,并认真研究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比如说,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使得我国的行政体制从传统的“一府两院”时代正式进入“一府一委二院”时代。这是我国政治体制变迁中的一件大事,然而笔者通过检索中国期刊网发现,讨论这一重大事情的多是法学学者、特别是行政法学者,只有少数政治学者在讨论国家监察这一重大的研究领域。

第三,新时代新政治学学科的学科体系建设要从三个方面实现内容创新。一是传统二级学科的内容升级。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传统二级学科在40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理论,为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提供了智力支持。但相较于我国政治建设过程中的实践创新,也存在知识脱节、陈旧等问题,亟须通过深入的实证研究,推动这些传统二级学科的内容升级。二是大力发展新兴二级学科。我国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实践产生了很多新问题、新需求,这就需要新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新兴二级学科的出现是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内在必然要求,在过去几十年中,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已经涌现许多新兴学科比如农村政治学、基层政治学、民族政治学等,但这还远远不够,发展新兴学科是新政治学学科建设下一步的重要任务。三是支持交叉学科的发展。新工业革命与国家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不是传统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可以独立解决的,例如,网络空间治理、数字货币与国际货币体系等新兴问题,需要经济学、统计学、法学等学科的参与,也需要计算机、电子工程、自动控制等理工学科的协同支撑。为此,我们必须鼓励、支持和培育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发展。

## 五、新政治学学科建设需要使用新方法与新技术

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要使用新方法与新技术。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加强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加强与工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融合,积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另一方面,要立足中国国情,创新独特的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强调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特别提倡历史政治学的研究,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研究。

第一,继续加强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对量化研究的工具,我们还应该保持学习与引进的态度。数学是各个学科的基础,我们需要学习量化研究的工具,运用这一工具来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学理论,特别是在人才培养体系中,需要加入更多有关量化研究方面的内容。诚然,将定量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研究领域,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行为主义运动。美国政治学者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非西方的新兴民族国家,把基于西方多元社会的政治学理论通过量化的科学形式普遍化为一般性的政治学理论,对此,我们需要保持警惕。总而言之,我们在加强运用定量方法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一些基于西方多元社会的政治学理论。

第二,要善于运用新技术。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轨道,网络空间、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这些技术已经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量子信息等新技术也在改变着我们传统的计算方式。人们越来越依赖虚拟的网络空间,同时也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留下越来越多的各种非结构化的定性数据,如何把这些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可视化的量化数据,人工智能所提供的机器深度学习、深度挖掘等工具,再加上自然语言处理<sup>①</sup>等新兴方法的帮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政治学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日益发展,新的工具也会涌现

① 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是一门融语言学、计算机科学、数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出来,对此,政治学者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敏锐的视角来推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新发展。我们要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政治学研究的深度融合,产生新的研究方法空间,进而全方位、全要素地建构数字化时代政治学学术体系。

第三,要注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特别要倡导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场景的不同决定了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政治文化进一步左右了人们对政治生活有着不同的认知与理解,并有着特定的政治行为方式,这些都最终影响了可能的政治结果以及政治道路的选择。正如杨光斌教授所提倡的:“中国历史的政治史、国家史特性意味着,历史不但是历史学研究范畴,也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这种统一的研究路径就是历史政治学。不同于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不仅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更重要的是其本体论价值,回答的是各国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行为是怎么来的,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政治与历史上的政治的关联性提供了清晰的解释。”<sup>①</sup>因此,我们要注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政治运行的特殊历史场景<sup>②</sup>。

第四,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要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学研究的指导。政治学具有科学性,也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而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流意识形态,显然,政治学学科的建设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此,政治学学科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争取国际话语权,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五,要重视把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应用于政治学的人才培养创新。我们要利用新方法与新技术去推动政治学教育教学的实践变革,针对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教学实践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展开研究,全面推进政治学人才培养与大数据、人工智能走向深度融合,探索实施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政治学人才培养体系。培养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需求的、能够为世界走向舞台中心承担起责任的、面向未来的政治学高素质人才。

## 六、结论

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势在必行,这是国家总体教育改革的需求。目前,新工科为主导的学科建设已经带动了新医科、新农科的建设,而新文科建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其中,“新经济学”“新法科”的建设已经先行一步,我们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也需要迎头赶上。新政治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也刻不容缓,这既是服务于国家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战略的需求,也是我们政治学学者维护自己学科地位与尊严的必要举措。为此,笔者在文中提出了新政治学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路径供同仁思考,强调新政治学学科的建设首先要转变学科建设的理念;其次要调整学科建设的内容;最后要使用新方法与新技术。未来已来,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日新月异地速度发生着,中国社会也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政治学学者应该对此高度关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再塑政治学学科,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

作者:卢春龙,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市,102249)

(责任编辑:刘杰)

① 杨光斌:《什么是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

② 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